

浙東游擊縱隊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张爱萍

DQ05/16

目 录

一	领命南渡杭州湾.....	(3)
二	宓家埭会议.....	(13)
三	抗日烽火燃遍浙东大地.....	(24)
四	风云突变，三北告急.....	(36)
五	消灭艾庆璋.....	(56)
六	捷报声声春意浓.....	(74)
七	在反“清乡”的日子里.....	(90)
八	争取团结田张抗日.....	(99)
九	树欲静而风不止.....	(112)
十	战火中打出新四军旗帜.....	(127)
十一	分散游击，转危为安.....	(136)
十二	严峻的考验.....	(150)
十三	艰难与胜利同在.....	(165)
十四	武装保卫秋收.....	(181)
十五	空前的好形势.....	(196)
十六	准备大反攻.....	(207)
十七	血洒东海大鱼山.....	(221)
十八	收编绿林军.....	(233)
十九	解救上虞之围.....	(243)
二十	托勒特和板本.....	(254)

二十一	富春江会师.....	(266)
二十二	讨伐田岫山.....	(274)
二十三	短暂的欢乐.....	(287)
二十四	忍让为国，挥泪告别浙东父老.....	(297)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在全国开辟了十九块解放区，浙东解放区是其中的一个。浙东游击纵队是新四军的一部分，建立较晚，是一支年轻的抗日武装。

浙东，原是浙水（钱塘江）以东地区的统称。但我们当时所说的浙东解放区，不仅包括了今天的宁（波）绍（兴）金（华）所属的大部分县治，包括了杭州、舟山所属的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了杭州湾以北上海近郊的浦东、浦西及海北（浙江北部的海宁、平湖）地区。因此，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那时所指的浙东，是一个扩大了地理概念；它以四明山为中心，向南伸展到金华山脉，向北楔入苏南境内，向东延伸到东海，海岸曲折多港湾。限于当时的斗争形势，通常应属浙东的天台山脉，不包括在解放区之内。这里北临上海，西近杭州，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侵华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命脉所在，是国民党统治较强的地区，是盟军实施反攻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军发展东南沿海游击战争的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浙东解放区不是由新四军军部派主力部队开辟的，浙东游击纵队的诞生，既不是主力部队播下的火种，也非完全土生土长。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是由浦东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华中局和新四军派来的大批干部组成并发展起来的。浙东游击纵队的番号，正式宣布于一九四

四年一月五日。这就是说，在这之前，她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灰色隐蔽。其间，用过多种不同的番号，委实是迭经变化。前期，部队的番号多变，且又迟迟不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这不只是历史的真实，它还生动地反映了这支人民武装成长、发展、壮大的某些特点。浙东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是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又由于一开始就活动在蒋介石的“家门口”，因而格外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这支年轻的部队，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既要与日伪军作战，又要对付顽军的频繁进攻；这显示了浙东地区斗争的尖锐复杂，从而也为我们展示了浙东游击纵队所走过的颇有特色的战斗道路。

一 领命南渡杭州湾

那是一九四二年的六月。我们新四军一师一旅一团在江苏泰兴县拔除了日军侵占的宣家堡据点。这天清晨，我正指挥部队打垮自北而南、从泰州方向前来向我部进行反扑的数千日伪军时，机要员给我送来了一份急电。电报上指名要我立即赶去师部报到，说是“另有任用”。

到了师部，粟裕师长亲自同我谈话，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要调我去浙江工作。不错，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我都在浙江，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跟随粟裕师长领导的挺进师离开浙南，开赴皖南抗日前线。四年多来，我对浙江的情况是比较关心的，知道浙江的大片土地已经沦入日军之手，当年红军挺进师的老政委、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前不久，日军沿浙赣线向南进犯，打到了我的老家江西，后来又退守金（华）兰（溪）。可以想象，浙江人民正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但我不太清楚，浙江敌后的游击战争是不是开展起来了。

粟师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指着地图向我介绍了当前浙江的局势。我注视着上海、杭州、宁波之间所形成的三角地带，知道这是全国著名的好地方。可粟师长要我特别注意这个三角地带中间的杭州湾和浙东沿海海域所处的战略地位。他要我记住，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浙东沿海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了，日军为了巩固其对中国大陆的占领，一定要死死地守住浙东。我们要发展东南沿海敌后的游击战争，也必须在浙东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渐打通浙东与苏南、苏中的联系。说着，他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的狭长地带，在地图上点戳着画了个椭圆形的圈，眼中闪耀着喜悦、兴奋的光芒。“看到吗？就在这块平原上，已经有了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队伍很年轻，总共才有几百个人。不过，比起当年的挺进师来，也不算少了。”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那时，我们经常分散打游击，三五个人便是一个战斗单位，几个月不能进房子，无分阴晴雨雪，都以山林、岩洞为家，粟师长的身边也有一二十个人。尽管这样，挺进师还是坚持下来了嘛。今天，粟师长旧话重提，显然是要我作好艰苦奋斗的准备。他见我神色严峻，默默点头，却又顾自笑了起来，十分深情地说：“你们到了那里，要依靠地方党，依靠当地群众，长期坚持，站稳脚跟，可不能背了包袱回来。”我当场向粟师长下了保证：“一定站稳脚跟，坚持斗争。”接着，他又同我谈了还有一些什么人一道去，路上怎么走等等的问题。处事周密、细致，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让我把头发留起来，说：“光秃秃的和尚头，很容易叫人看出是个当兵的。”末了，他还十分关切地告诉我，组织上决定叫机要员王梅林和我一起走，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首长考虑得真周到啊！那时，我和王梅林还没有结婚，她是上海人，到了江南，说话、行动的确比我方便多了。

数天之后，没等我把头发蓄长，奉令调往浙东工作的同志都到师部会合了。他们大多是从新四军军部来的。哦，真不少呢！何克希、张文碧、罗白桦、张季伦、张浪、余旭、戈扬等，男男女女，共有二十来人。这当中，张文碧同志和我是挺进师的老战友，别的我都不熟悉。我们互相谈起首长交代任务

的情况，他们向我传达了陈毅军长的指示，我也向他们讲了粟师长同我谈话的内容。真有意思，陈老总在为他们送行的时候特地关照说，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很明显，两位领导人对于打开浙东的局面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都又充分估计了困难。

七月上旬，我们从苏中出发了。具体的行动路线是，从苏中启东上船，经崇明岛渡过长江口，然后在浦东登船，横渡杭州湾。行前，负责接送我们的周一光同志要大家一律脱下军装、更换便衣。那便衣也不是随便穿上一套就可以的，而是要根据各人的长相、气质、风度加以装扮。象我和张季伦，个子大，肤色黧黑，只能扮作伙计、船老大之类的粗人；象张浪，文质彬彬，只能扮个学生意的人；女同志的花样更多一些，扮成小姐、太太，或者是姑娘、学生，都要因人而异；何克希文化水平高，风度也不错，周一光特地分给他一套崭新的细布衫裤，外加一柄折扇，他俨然是个做生意的老板；他的警卫员孙菊祥自然就做了“跟班”。脱下军装不算，还要留下随身佩带的枪支。这事，我们的几个警卫员可就想了不通了。他们说，“不叫带枪，赤手空拳怎么保卫首长？”那只好由我们带头先卸下枪。记得何克希就对小孙说过这样的话：“放下放下，放下旧的去搞新的，摘掉小的去搞大的，将来打开了浙东的局面，还愁没有枪！”再一条，就是要事先对好口供，熟记自己的化名、职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与谁结伴，是什么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漏了嘴。

对于这一套，我觉得很别扭，也很气闷。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我都在战斗部队里工作，特别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以后，我就一直在主力部队中带兵打仗，真刀真

枪、大锣大鼓地搞惯了，这样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行动，真不是滋味。但又想到自己是离开大部队了、离开根据地了，一路上要过很多的封锁线，要穿越日寇统治下的全国最大城市上海的郊区，途中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只能暂时忍一忍，只能完全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切切不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走路也罢，坐船也罢，住下来也罢，我的脑子里一刻也不得安静。因为耳旁听到的、眼前看到的，时时处处都有日伪军统治的阴影。中国人，却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自由行走。一想起这个，真叫人揪心。相比之下，倍觉苏中根据地的可爱，那里的群众可以自由行走，放声歌唱。今天，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了，尽管国民党当局接连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很大的损失，数以千计的抗日健儿惨遭杀害。但是，全国人民所掀起的抗日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皖南事变的枪声还没止息，党中央便已下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如今，驰骋在大江南北敌人后方广阔战场上的新四军，共有七个师，九万余人。这和坚持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下山后，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时的一万二千人相比，增加了七倍。从中可以看出，大江南北敌后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实是很好的。不过，我们也有许多不利的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阻挠和竭力破坏，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的时间，比八路军迟了一年还不止。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却无权抗日救国，没有抗日的自由。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恐怕是很难想象的。那时，我们真是愤怒到极点了。

浙江，对于我来说并不生疏。远的不讲，就说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吧。那时，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的呼声响彻全国。但国民党当局依旧顽固地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纠集七个多师的兵力，划江山、衢县、汤溪、龙游、遂昌、松阳、宣平、龙泉、浦城九县为“清剿区”，下令“痛歼”，企图将红军挺进师斩尽杀绝。之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和我们坐下来谈判，可又玩了许多花招，拖了很久，才达成协议。所以，当我们奉令开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集中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四月了。而这时，浙江最为富庶的杭嘉湖地区，早已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大家知道，南京附近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江南抗日义勇军”（即“江抗”）的东进，那都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以后的事情了。说起“江抗”，何克希同志还曾经担任过“江抗”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呢。在这以前，早在一九三八年，上海党组织就曾派他和别的一些同志到嘉定、常熟、江阴、无锡等地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所以，他对于开展江南敌后游击战争，比我有经验得多。他对我说，一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一是要打破日伪顽的夹击。途中，我对后一条想得比较多，并且急着要了解目前浙东的情况。是周一光告诉了我，他说，“要了解浙东，就先要了解浦东。”

这时，我们正行进在上海近郊黄浦江以东的土地上，耳中听人介绍浦东的情况，感到特别的亲切。

浦东，位于江苏东南一隅，辖有川沙、南汇、奉贤三个县，两面环海，北临长江口，西靠黄浦江，与上海市区隔江相望。境内一片平原，海涂宽广，河汉纵横，水陆交通十分发达。自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以后，这里便是日伪军强化统治的地区，也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活动的区域。总之，地方不大，情况却很复杂。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乘机作乱，土豪劣绅各霸一方，他们勾结日伪军，敲诈勒索、奸淫掳掠，使浦东人民深受苦难。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党的工作在这里也很活

跃，并率先举起了抗日的旗帜。

早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即日军攻占宁波、绍兴，打通杭甬线的前两个月，党中央便已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要加强对沪、杭、甬三角地区的领导，伺机向浙东发展，创建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后，党中央又再次指示华中局迅速开辟浙闽沿海的游击战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同志，便于这年六月在江苏无锡赛门，向当时负责闽浙赣皖联络站工作的谭启龙同志面授了“以浦东作为跳板，设法向南发展，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并将路南特委、浦东工委（简称浦委），包括打入伪十三师五十团和六团进行兵运工作的党组织关系都交由谭启龙负责领导。

当时，受浦委领导的共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隶属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指挥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淞沪五支队）。这是一支典型的人民抗日武装。她初建于一九三七年底。其时，上海刚刚沦陷。爱国青年和流落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失去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初期，他们分别以南汇县保卫团、奉贤县人民自卫团的面目出现，共有三百余人。因为他们坚决抗战、纪律严明，成了日伪军主要的“清乡”对象，且又屡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李志明部队的胁迫，处境异常困难，不得不缩编精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著名的汇角反“扫荡”战斗。南汇县保卫团二中队的五十多位同志，面对四面包围、水陆并进的一千余名日军和两架日机的进攻，毫无惧色。经六小时激战，粉碎了敌人“拉网合围，聚而歼之”的阴谋。战斗中，中队长周大根等二十七人壮烈牺牲。群众称这个中队为“抗日的旗帜”。

深受浦东人民爱戴的周大根，被称为“南汇人民的好儿子”。他曾经就读于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因为激烈反对蒋

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并于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南汇县最早的地下党县委书记，在当地多次领导过农民暴动和盐民斗争。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他化名周务农给奉贤的一个大恶霸下书警告：“网儿虽大，捉不尽东海鱼虾；钢刀虽快，杀不尽天下贫民。”这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浩气歌。当时，周大根才二十二岁。不久，他不幸被捕，关在苏州监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出狱后，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是浦东地区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发起人之一。在汇角战斗中，他身中数弹，直到牺牲前还鼓励同志们“坚持到底！”那时，周一光就曾经对我说过，“周大根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浦东人民的心中。”在此顺便提一下，解放后，奉贤人民在为烈士们建立纪念碑时，特地在碑上镌刻了周大根同志所写的那首浩气歌。

如同汇角那样残酷的战斗，在浦东地区屡有发生；如同周大根那样宁死不屈的中华儿女，在浦东地区更是不断涌现。一九四〇年二月，“抗卫二大”（由南汇县保卫团四中队改编）不幸在二灶泓一带陷入两千余名日军的重围，浦委委员朱君务等十多个同志被俘，有的被当场杀害。朱君务等六人被关押于祝桥镇，他们不仅经受了严刑拷打的考验，且又几次痛斥汉奸的劝降，最后全部被敌人惨杀。牺牲前，他们还高呼革命口号。也是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当地群众舍命相助，不少同志得以脱险。大队长连柏生就是被望楼乡杨家宅的一个名叫傅家囡的妇女以丈夫相认而掩护下来的。

英雄的淞沪五支队就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创建、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曾经一度逼走驻守南汇县城的敌人，多次重创下乡抢掠的日军，歼灭成连成排的伪军，严惩人民恨之入骨的汉奸、卖国贼，闹得日伪汉奸始终无法在上海近郊建立他们的所

谓“王道乐土”。相反，游击队却越打越多。到一九四一年五月，除去主力部队不算，全区范围内已建立了十五个常备中队。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抗日自卫武装，它蓬勃兴起于敌人“强化治安”、交通发达的浦东，是特别能够说明那里的大好抗日斗争形势的。这时，浦委通过统战关系，取得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的承认，将浦东地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时，就是以“抗卫二大”和常备中队为基础的。支队共辖有一大、二大、三大、四大和常备大队等五个大队，支队长连柏生，副支队长王才林。支队和大队的主要干部，有的曾经去“江抗”学习、参观，有的由“江抗”派来。这支部队长期战斗在全面伪化，据点林立，“扫荡”、“清乡”频繁的浦东地区，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具有优良的战斗作风，战斗力较强。对此，谭震林同志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浦东部队素质好，群众纪律严格，很精干，但人员太少，可以争取更大发展。”

第二支部队，是在汪伪军第十三师第二十五旅第五十团（含第六团一部）中由我党控制的一部分力量。起先，浦委派了几个干部打入伪五十团二营、三营，开展策反工作，很快控制了七个连的武装，建立了四个党支部，共产党员由十三人发展到五十七人。这支部队表面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可他们竟能够在自己的防区内实行“净化环境”，采取各种方式处置、镇压死心塌地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单是这一点，就很可能说明这支部队的实质了。

这时，由浦委先后派出的朱人侠、张大鹏和潘林儒等同志，已经完成了侦察浙东的任务回到浦东，并通过关系从国民党“宗德公署”领来了一万发子弹、一千枚手榴弹。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始，浦东部队分批南

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地区（即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五月十日，姜文光、朱人侠率领淞沪五支队一个侦察班和我党控制的伪五十团三营九连一个排，共五十多人，作为先遣部队，首批到达三北。为了灰色隐蔽，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的番号。六月十六日，蔡群帆、林有璋率领五支队一大队一个中队和四大队一个中队，共一百三十多人，到达三北，仍沿用淞沪五支队的番号，取名为五支四大。七月，朱人俊率领从伪五十团八连中拉出的一个排四十多人，到达三北。不久，朱人俊回浦东。同月，姚镜人、陆阳率领从伪五十团中拉出的守望队一百多人，在姚北登陆，充实到宗德三大。八月初，凌汉琪、王荣桂率领淞沪五支队二大队和三大队的两个中队，共一百多人，到达三北，编入宗德三大和五支四大。八月底，潘林儒率领常备大队和特务区队一百多人，到达三北，编入五支四大。八月十八日，朱人俊、方晓等率领从伪五十团中拉出的二营六连，三营七连、八连，以及该团第二期干训队学员（包括第一期干训队的部分学员），共三百余人，南渡来三北，取得了“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的番号。

浦东部队先后到浙东三北地区的共七批、八百人左右。这支部队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也是创建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

不仅如此，浦东的党，浦东的部队，为了适应当时当地抗日斗争的需要，还在浦东与浙东之间开辟了海上通道，沟通了苏北、浦东、浙东之间的联系，甚至能够越黄海而抵山东沿海我八路军控制的地域。我们这些人从苏中南下，渡江又渡海，走的就是他们打通的航道。在我们之前，在我们之后，无论是人员的来往，武器、物资、经费的输送，也都从海上航运。基

本上做到了安全可靠。

由此可见，无论是山地、平原、江河、湖泊、大海，我们党所领导的部队都是可以适应的，都可以在那里生存发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我们在浦东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于党领导的浦东抗日斗争情况的了解也只是初步的。但是，浦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且也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进一步增强了打开浙东敌后抗日斗争新局面的决心与信心。我想：这里的武装斗争是因地制宜的，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内线外线，互相配合，灵活得很。这里的工作又是多种多样的，有城市工作，有农村工作，有沿海渔民、盐民的工作，有海上的工作，也有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还有伪军的工作，方方面面都发动起来了。土生土长，本地干部多，群众基础好，这是浦东抗日队伍的一个显著的特色，也是他们能够在狭小的地区内长期坚持斗争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去的浙东，比浦东大多了，浦东能坚持，浙东还用说吗？

二 宓家埭会议

一九四二年七月的一天，骄阳似火，酷热难当，我们在慈溪北部的古窑浦登陆。登陆的情景，很值得写上几句。

我们乘坐的帆船是在平潮的时候落篷停泊的。还在帆船乘风破浪的时候，我们便已经在海天相接的地方看到了那高高的、长长的海堤。堤外没有码头，也没有港湾，只有一片灰黑、广阔的海涂。虽说木船吃水不深，但也被抛搁在远离堤坝数百米以外的泥滩上了。所谓靠岸，那就是让木船驶到搁浅为止，船底碰到泥滩不能动了。等我们收拾好东西，海水又已退去了许多，笨重的木船也陡然增高了许多，动作再慢一点的话，怕要搭梯子“下楼”了。当时，我们顾不得脱鞋、卷裤管，一个个都赶着往海水里跳。只听得脚下咕咕地响，双腿直往下陷。没走过海涂的人一时慌了手脚，拼命地提腿，不等后脚拔出，前脚又陷进了淤泥，又咸又苦的烂泥和浑浊的海水溅了一身。当我们一步一陷地踏上海堤时，一个个都喘得厉害。这时，回过头去一看，我们乘坐的船只已经完全晾在海涂上了，船底弓形的龙骨，全都裸露出来了，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就这样，我们满脸泥浆，说说笑笑地过了海堤。作为一个军人，我多看了一会。这无遮无拦、一望无际的海涂，也是一种地形地物。杭州湾两岸，有的是海涂，长达数公里的滩涂也不少见。说不定有朝一日，海涂也会成为作战的舞台，在这上面演出精